

青黄不接，轮到自己家做“派饭”时，什么菜也没有，幸好孩子下河玩水抓到一条小鱼，好不容易做好一道菜，放在桌上时，一不小心让猫给吃了，惹出女主人的一番呼天抢地。

“派饭”这种规定，本意是让干部能更加接近群众，不曾料到反而让干群关系更加不如人意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如此说来，你擅长从人性以及社会的裂缝中切入的文学风格，从那时就显露端倪了。当时你的作品本有机会在几家重要文学期刊上抛头露面，为什么你不同意其修改意见？是年轻气盛，还是你认为编辑的修改意见是错误的？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不是可以说你明你是个特别倔强的人？

刘醒龙：无论是什么原因，事实证明自己这样选择是可以的。当初拒绝的理由是社会应当容纳各种性格的人，这也从文学终于容纳了我这种性格的人得以证明。也许从一开始就如此，大家晓得我的这种秉性，后来有些编辑想动我稿子时，基本上都不与我打招呼。比如，80年代自己写的《大别山之迷》系列，共有中短篇十几部，无一例外都被改为《大别山之谜》。特别是省内一家刊物，我都明确地表示为要用“迷”，编辑们仍然任用手中生杀大权改为“谜”。最近在编一套文集，出版方发来清样，又要将上面的“迷”改为“谜”。文学这一行，个性尤为关键，千人一面，千篇一律，一定是庸俗之物。当然，也有改得好的。1996年第一期《上海文学》发表的中篇小说《分享艰难》，就是从《迷你王八》改过来的。后来我当编辑，偶尔也给作者改篇名，比如鲁敏的《逝者的恩泽》原先叫

一切的幸福与奇迹，只不过是表明将路走对了，将做的事做对了。

《逝者的恩泽》，宋小词的《天使的颜色》原本为《瓜连籽，籽连瓜》等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1983年夏天你是怎么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的？

刘醒龙：当时县文化馆缺人，又不像现在只有从大专以上学历的人中招考，普遍采用从本地业余作者中选择佼佼者调入，所谓借调，基本等同于试用。同时也是等待破解复杂的人事手续。其实我在工厂干得正风顺水，虽然在车间当车工，但按那时急于选拔有文化的青年到领导岗位的风尚，完全有可能成为厂长什么的。在将要离开工厂的那一段，内心曾经有过挣扎，县经委和县工业局的领导也曾竭力挽留，但最终还是文学理想占了上风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1984年，你的小说处女作《黑蝴蝶·黑蝴蝶……》即将发表在《安徽文学》第四期上，3月在安徽省霍山县漫水河镇上的一

家小旅馆遇上你这篇小說的责编苗振亚。这样的人生奇遇，在你的人生中也有好多次，你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吗？

天台山的僧人曾经预言你未来会了不得，你自己相信命运或者说宿命存在吗？你说“小说是一种奇迹”，是不是上天安排这样意义上的“奇迹”？

刘醒龙：一切的幸福与奇迹，只不过是表明将路走对了，将做的事做对了。就像游泳，从开始将其作为锻炼方式后，许多年来，每天早起必定先去游泳池。武汉封城后，游泳池不开放，就在家上跑步机，从此也一发不可收。生活当中，有路不去走，所有的路都是错的；有能力不去干事，所有的事都会是不对的。人的一生，说长又不长，说短又不短，能遇上一些惊艳的事情，肯定别有深意。但也不能太当真，真的以为是上天眷顾，只能将其当成一种额外的能量，使得自己多付出一些，多努力一些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黑蝴蝶·黑蝴蝶……》发表后不久，是什么原因又主动要求，结束借调，返回县阀门厂工作？一个县文化馆内部都这么复杂吗？这些年你在多地文化单位辗转，有没有新的体会？

刘醒龙：最近老有人说，根据中篇小说《秋风醉了》改编的电影《背靠背脸对脸》，说是如何经典，豆瓣上评分如何高，还说这种作品，

下图：刘醒龙，现为湖北省文联主席，《芳草》文学杂志主编。

